



●策划人语

以“人”为本

□蔡宇丹

一项实行了30年的波澜壮阔的国策背后，总能折射出个人的命运轨迹，无论是名人还是草根。

对于马寅初而言，他因为《新人口论》被迫辞掉北大校长职务，却始终坚信，自己的理论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。

而对于正处于婚育期的“独一代”梁颖来说，当她最担心家里老人生病时，她才开始羡慕那些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了。

本期封面故事，追溯了30年前中共中央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(以下简称《公开信》)出台的前前后后。同时试图从一个人口普查员的视角以及“独一代”的成长历程，来微观透视一项基本国策执行30年来的社会变迁。

30年后，《公开信》中，那句意味深长的“到三十年以后，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，也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”的话，在当下引发了诸多解读与推测。

在计划生育公开信发表30年之际，与第六次人口普查即将进行的节点上，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，却是旁敲侧击、欲言又止；而官方的态度则是谨慎再谨慎。

人口政策，对于一个家庭而言，只是多生少生孩子的问题。而对一个国家来讲，则是事关未来几十年国力竞争的国家战略。就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，国外某些人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，实际上是上不愿意我们发展起来。

11月1日，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即将展开。这场耗资80亿元，动用600万普查员进行的国家工程，究竟和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又会不会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？

而老龄化社会、空巢家庭、独一代、闪婚闪离……这些中国式热词，都能从一张多达45项问题的人口普查调查表中看出端倪。而决策者们，将从那些浩如烟海的数据中，对中国的就业、社保、社会资源分配等国策做出前瞻与决断，包括未来的人口政策。

出品：深度工作室
领衔策划：蔡宇丹
设计：马晓迪
读者报料邮箱
shendu@qlwb.com.cn

一封公开信 影响一代人

本报专访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起草人之一张敏才

本报记者 鲁超国

中共中央给人民群众曾写过两封很重要的信。

一封是1935年8月1日，红军在长征途中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、中共中央发表的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，即著名的《八一宣言》。

另一封是1980年9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表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(以下简称公开信)。

一封是号召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共同抗日的救国书，一封则是号召全国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”的倡议信。

“可见当时党中央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。”作为八位起草人之一的张敏才至今对《公开信》怀着一颗敬畏的心，并称自己是这封信的坚定“守望者”，如果谁说它不好，他都想站出来与对方辩论一番。

目前，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《公开信》发表30周年的活动，本报记者辗转找到张敏才，了解了这封《公开信》诞生的前前后后。

“当时搞计划生育是被逼出来的”

“大跃进”时毛泽东提出“人多力量大”的口号，有人认为这句口号很大程度上鼓励多生孩子。

张敏才如今已75岁高龄。1980年起草公开信的时候，他的职务是北京军区计生办主任，那时他有30年军龄、大学毕业20年，10多年的计生工作经验。

然而，在《公开信》的8个起草人之中，张敏才排名最后，其他七位是栗秀真、梅行、苏沛、宋健、刘铮、刘庆山和王连城。

张敏才算是专门为了起

草公开信被“借调”过去的，“说白了，借调过去就是干活的”，直到现在，他都认为那是一个对他自身而言难得的学习机会。

“当时搞计划生育也是被逼出来的。”张敏才直言。

世界上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国家就被称为人口大国。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时，共和国的人口基数将近6亿。1980年已经近10亿。

时光倒流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

“由于旧中国近百年的战乱，那个时候我国工业和农业领域的机械化水平还很低，尤其是对农业，土壤改良以及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都主要是靠人力完成的。”

“没有战争，医疗条件也好了，出生率没变，但是死亡率大大降低，也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。”张敏才分析。

当时，多生的原因除了受“多子多福”的传统观念影响外，还有几个因素。

一是懂避孕，又不敢问。张敏才在辽宁调研时遇到过一位村妇，结婚后一年生一个，一下生了七八个，后来不想生了，但是已经怀孕了，就故意上蹿下跳，用十几尺白布缠腰，希望能把孩子弄出来，结果不成，村妇照自己肚子上砍了三刀。

二是迷信盛行，很多人认

为孩子是送子娘娘送的，上天赐予的，给几个就得生几个。

“大跃进”时期，毛泽东提出了“人多力量大”的口号，后期的专家学者为此发生过争议，有的认为这句口号很大程度上鼓励多生孩子，有的则认为这只是一单纯的“团结精神”。

“不管怎样，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实是，人口增长速度特别快，一对夫妇生三个以上的不是少数。”

据统计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20%以上，1963年最高达到33.50%。

这期间，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是1960年，出生率是20.86%，死亡率是25.43%，而这一阶段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。

“新中国成立后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虽然把注意力投向经济建设，但老百姓还是过不上好日子。矛盾就在人口多，资源少。”孩子们上学，教室不够，就实行两班倒或者三班倒，上午一拨学生上课，另一拨学生去放羊、拾粪，下午再倒换过来。

“计划生育就像摸着石头过河”

“老大憨厚、老二聪明、老三猴精”，不要老二老三，会不

会把未来的发明家、科学家弄没了？

“计划生育一定要搞，当时已经达成共识。但是如何搞？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。”《公开信》发表前，中共中央领导曾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。

在具体对策上，有专家建议推行“无婴年”，比如今年宣布，明年为全国“无婴年”，3亿多对育龄夫妇全部停产。这样停一年，生一年，幼儿园、学校都将一年爆满，隔年缺班，经济、教育和其它相关事业，将会受到轮番冲击和影响。

也有专家建议，给每对爷爷奶奶两个孙辈指标，自行调节。爷爷奶奶们普遍有六七个子。他们只有两个孩子能分到生育指标，多数分不到。如果配偶也没有分到指标，一个也不能生。这势必引发许多家庭矛盾。

还有专家建议，在严格限制生育三胎的前提下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。

“有专家说北京宣武区已经有人尝试，别的专家说北京是向天津学习的，接着又有专家说，山东实施得早。所以，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’是山东经验，是从群众中来的。”张敏才这样回忆起当年的座谈会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山东荣成市埠柳公社北城大队的村支部委员、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鞠洪泽，少受村里人的白眼和挖苦。鞠洪泽想到自己是村干部，是党员，为什么自己不能走在前面，给群众做个表率？他和鞠广远、鞠传祥等几个党员一起，向全公社、全县发出了《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》的倡议书。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，1978年底，全县领取《独生子女优待证》的夫妇达16891对，占一孩夫妇总数的93%。



人物简介

张敏才：湖南人，1935年出生。中国人口学会原秘书长、教授，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。发表论文报告上百篇，还主编和参编人口书籍10余本。1994年，他获得首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2008年，获得中华人口奖。